

可替代收入渠道、家庭劳动力剩余与 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

谢秋山, 马润生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长沙 410083)

摘要: 基于 CGSS 2010 相关数据的多项 Logistic 分析, 研究发现: 农村居民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关键原因; 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民工选择回流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务工具有显著性的影响; 移民健康效应并不确定;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和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分工制约, 要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就业岗位必须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在内的、全面的、更具比较优势的可替代收入渠道。

关键词: 家庭分工; 劳动力数量; 可替代收入渠道; 务工; 务农

中图分类号: 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3) 03-0090-07

The Ways of Alternative Income , Family Labor Surplus and Farmers' Choose between "Work in the city" or "Make a Living on the Land"

XIE Qiu-shan , MA Run-she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83 ,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GSS 2010 survey data this paper did multinomial analysis and found that lack of ways obtaining alternative income is the critical factor of the farmers' choice between "work in the city work" or "make a living on the land". Th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ndividual's choose between return to farming and continue to work in the city. The effect of healthy is uncertainty. Individuals' characteristics , such as age , gender , education , and regions different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farmers' choice between "work in city" or "make a living on the land". This means , if want to allure more farmers to work in the city city's employments need to provide a income model with more compared advantages and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 considered the constraint of intra-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 which is from the Household

收稿日期: 2012-08-10; 修订日期: 2012-11-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11BZZ002)。

作者简介: 谢秋山(1981-), 内蒙古赤峰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社会统计分析、制度经济学、土地经济学。

Responsibility System.

Keywords: intra-household labor division; th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the ways of alternative income; make a living on city work; make a living on the land

从理论逻辑上看,农村居民选择在家乡务农,还是选择进城务工,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农村居民务农是保证农业持续发展,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性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是工业化生产劳动力需求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现实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国内的农民流动又出现了一个近似悖论的现象,那就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性的社会事实”^[1],但东南沿海工业城市却出现“民工荒”,大量农民工选择返乡务农,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这些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在务农与务工之间作出选择?

一、文献回顾

已有的研究对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探讨,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照搬或沿袭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来讨论和考察影响城乡人口流动的因素。简单地,可以把这些讨论大体上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主要强调城乡收入差异对于农村居民城乡流动的决定性作用。如托达罗认为有两点对于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城市真实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镇工作的概率^[2]。这二者相结合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如果长期预期收入低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民就不会迁入城市,做定居计划,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也不得不像钟摆一样,选择“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3]。第二种观点,主要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数量多寡对于农村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认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民进城务工的前提。围绕现在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有多少,或者说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的问题,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经不多,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4~6]。

这些宏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就近期形势,特别是国内工业化发展水平来看,要想让农村居民迅速市民化还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存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就业岗位相对不足和劳动力市场分割^①所造成的务工收入不足问题。所以,避开乡一城移民的视角,直接从微观层面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的务农务工选择也许更具有现实重要性。令人可喜的是,国内学者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7~10]。这些研究虽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出了一个相近的研究结论,即务农收入和务工收入差距是决定农村居民选择务农还是务工的关键原因。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的文献研究均未能意识到城乡收入差异仅仅是影响农村居民选择务工还是务农的一个方面,而且,城乡收入差异并不能很好的解释近年来的农民工“回流”现象。第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个体决策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居民的务农与务工选择问题,而未能认识到家庭分工对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制约;同时,这些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估算,无论是采用何种理论依据,使用何种估算法^②,都是对农村总体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而未能从家庭分工的视角,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估算。但在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家有田种,家庭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精神共同体,劳动力的分配必须满足每个家庭分工的需要,所以农村劳动力剩余的计算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即考察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第三,已有的定量研究均采用地方性的,比如某个省市的数据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缺乏利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作为支持,存在样

① 在中国,基于户籍制度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所带来的不仅是农村流动人口和城市非流动人口直接收入的差异,而且二者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基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目标,所以短期内加速推进农村居民向城市移民还有太多的困难。

②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使用多种方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数量进行了估算,如王检贵和丁守海在《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一文中列举和比较三种劳动力剩余数量的估算方法,分别是古典经济学算法、新古典经济学算法和标准结构比较估算法。

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综合已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和不足，我们需要用一个比城乡收入差异更为宏大的概念来理解农村居民务工与务农的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可替代收入渠道”。本文中，笔者把可替代收入渠道定义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特别是在城市中可能取得的，可以替代农业生产的，为农民提供稳定经济收益和养老、医疗保障的收入渠道。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采纳家庭分工的视角，主要考察农村“家庭劳动力剩余”和“可替代收入渠道”对于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影响。此外，基于移民健康效应理论，笔者还将考察“移民健康效应”在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中的影响。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每个农村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标准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去评估和考察每个家庭在满足农业生产之外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而是通过考察每个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工务农选择之间的关联，来间接考察家庭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之间的关联。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2010 年（CGSS 2010）数据。去除“非农业户口”、“蓝印户口”、“居民户口”、“城镇户口”个案，有“农业户口”个案 6040 个；同时，凡回答“不知道”、“不适用”、“不回答”和“其他应答而未回答的情况”删除，再删除每一变量中的缺失数据值，最终剩余有效个案 2044 个。基于 CGSS 2010 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方法，分层是外生的，不同省份的居民进入样本的概率是不同的，为此，在本文中我们依据“地区”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处理后的最终有效个案为 4763 个。

2. 变量统计描述

（1）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务农与务工选择”。这是一个比城乡人口迁移更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那些流动人口，也包含那些固守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居民群体。在 CGSS 2010 年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您工作经历及状况是？”问卷答案选项情况如表 1。

在表 1 中，我们看到有过或正在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居民不到 1/3，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居民占绝大多数，这就提醒我们，仅仅分析农民工的务农务工选择，或者说回流现象，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农村居民城市化迁移的困境。

表 1 因变量的分布情况		%
工作经历及状况		比例
1 =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		7.6
2 = 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		24.1
3 = 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		68.3

（2）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有两个。一是“可替代收入渠道”。在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问题：“您务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选项赋值情况如下：1 = 目前务农收入还比较理想；2 = 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差不多；3 = 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4 = 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绝大部分人选择了“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即“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最重要原因。二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在问卷中“请您谈谈您家目前的劳动力情况（在这里，家指的是与被访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的所有人）”，其中，第一个小问题是“16~65 岁有劳动能力的人有多少人”。这个问题主要用来测量每个农村家庭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基于家庭分工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当留守劳动力较多时，家庭劳动可以更多地由其他成员来承担，非市场型劳动对收入的替代作用就会比较强，劳动供给意愿也比较强；相反，如果留守劳动力少，家庭劳动无人承担，劳动供给意愿就会比较弱”^[11]。所以，每个家庭现有劳动力数量应该是决定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3）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变量。其中“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性有必要予以特别强调。就年龄来看，劳动经济学理论认为年龄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20~24 岁是劳动力流动的高峰，劳动者年龄越大，流动性越低。这主要

是基于三点：一是把劳动力迁移、进城务工看做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认为年龄越小，其工作时间越长，收益时间也就越长，在这项人力资本投资中所获得收益现值越大。二是迁移的心理成本理论，认为迁移会丧失原有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年龄越大的人，社会互动的需要越大，这样，与迁移相关的心理成本越大。三是，笔者认为，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年轻人生活在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着比父辈更高的期望，他们向往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其向城市迁移和进城务工的愿望也就更强烈。就身体健康状况而言，已有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存在移民健康效应，即新迁移人口的平均身体健康状况要好于迁入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12~14]，“身体更健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个人更倾向于自我寻求迁移”^[15]。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而言，他们背井离乡、缺乏家人邻里的社会网络支持，而且与在家乡务农相比，在城市务工工作强度往往比较高，所以，一个合理的逻辑推理是身体健康是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此外，基于照顾依赖性人口的需要和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事实，我们也把“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地区”作为必要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本文所用变量定义及其统计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性质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务农务工选择	定类	1 = 目前从事非农工作；2 = 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3 = 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	2.61	0.625
自变量	可替代收入渠道	定类	1 = 目前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有优势；2 = 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3 = 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	1.33	0.644
控制变量	家庭劳动力数量	连续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	2.98	1.297
	性别	定类	1 = 男；0 = 女	0.50	0.500
	年龄	连续	最小值为18，最大值为89	48.62	12.285
	家庭收入	连续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12260	17775.67	20096.67
	未成年子女数量	连续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6	0.89	0.921
	老人数量	连续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	0.37	0.583
	教育水平	连续	最小值为1，表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最大值为10表示“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	2.97	1.398
	婚姻状况	定类	1 = 已婚（包括分居未离婚）；2 = 离婚或丧偶；3 = 未婚、同居	1.12	0.403
	健康状况	定类	1 = 不健康；2 = 一般；3 = 健康	2.24	0.847
	地区	定类	1 = 东部地区 = 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省；2 = 中部地区 = 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3 = 西部地区 =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	2.53	0.592

三、实证模型与分析结果

1. 实证模型

笔者以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两个因素作为分析框架，建立模型。由于因变量属于多分类无序变量，且变量赋值分为三类，所以宜采用 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来分析。模型一般形式如下：

$$\log\left(\frac{P_2}{P_1}\right) = \alpha_1 + \sum_{i=1}^9 \beta_{1i}x_i + \theta_{1j} \sum_1^2 x_j \tag{1}$$

$$\log\left(\frac{P_3}{P_1}\right) = \alpha_2 + \sum_{i=1}^9 \beta_{2i}x_i + \theta_{2j} \sum_1^2 x_j \tag{2}$$

其中， P_1 、 P_2 、 P_3 分别为“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的概率；模型中以第1类“目前从事非农工作”为基准， $P_1 + P_2 + P_3 = 1$ 。 x_i 分别

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以及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老人数量和（东、中、西）地区等控制变量； x_j 为“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可替代收入渠道”两个自变量； β_{1i} 、 β_{2i} 、 θ_{1j} 和 θ_{2j} 为系数； α_i 为截距， $i = 1, 2$ 。

2. 统计检验与结果分析

如表 3 所示，模型 AI 中，就“目前务农，曾经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群体相比较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村居民，越可能选择回乡务农；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女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选择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越高。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则对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越容易选择务工；但家庭老年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的选择却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就东、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确如理论所推测的那样，西部农村居民务农的可能性更高；但就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务农的倾向性却更高，显著性水平小于 0.05；这可能是源于中部地区的自然条件更适合农业生产，农业收入较西部地区更高的原因造成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居民务农选择都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具体来看，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务工的可能性越大；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相比，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和“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家庭的农村居民更容易选择回乡务农。

表 3 多项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AI (P ₂ / P ₁)		A II (P ₃ / P ₁)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961 **	0.477	-2.01 ***	0.485
年龄	0.021 ***	0.007	0.055 ***	0.007
性别（参照组：男性）	0.303 *	0.156	1.249 ***	0.152
教育水平	-0.106 **	0.052	-0.376 ***	0.053
家庭年收入	0.000 **	0.000	0.000 **	0.000
未成年子女数量	-0.157 **	0.078	-0.149 **	0.077
老人数量	0.190	0.107	-0.069	0.109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或同居）				
已婚（包括分居未离婚）	-0.048	0.333	-0.349	0.343
离婚或丧偶	-0.544	0.442	-1.353 ***	0.447
健康状况（参照组：健康）				
不健康	0.221	0.232	0.522 **	0.225
一般	-0.106	0.170	-0.095	0.168
地区（参照组：西部）				
东部	-0.928 ***	0.248	-0.945 ***	0.244
中部	0.219 **	0.149	0.547 ***	0.148
收入渠道（参照组：农业收入不是主要收入来源）				
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	1.203 ***	0.161	1.739 ***	0.169
缺乏务农以外的可替代收入渠道	2.148 ***	0.178	3.292 ***	0.187
家庭劳动力数量	-0.166 ***	0.060	-0.207 ***	0.060
卡方值	1.418E3			
d. f	30			
Sig.	0.000			
-2loglikelihood	6.191E3			
Cox & Snell R	0.257			
Nagelkerke R	0.323			
Mcfadden	0.186			

注：P* < 0.1，P** < 0.05，P*** < 0.01；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

模型 AII 中，就“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相比较，年龄、性别、

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年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地区等控制变量的影响与模型 AI 的影响是一致的，只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差异。但婚姻状况的影响有些不同，“离婚或丧偶”的农村居民更可能选择务工。就自变量来看，“可替代收入渠道”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都是与模型 AI 比较接近的，也只是存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的微小差异。

综合模型 AI 和 AII，我们不难看出，“可替代收入渠道假设”和“家庭劳动力剩余假设”都得到了证实。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和基于家庭分工制约的农村家庭劳动力相对不足才是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务农和留在农村的关键影响因素。一方面，对于曾经有过进城务工经验的群体而言，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少，他们选择“务农”的倾向越高，这说明农民工选择“回流”务农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同时，与“务农并非主要收入来源”群体相比较，认为“务农收入比务工收入有优势”的群体也更可能选择务农，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AII 中“收入渠道”的两个系数值和“家庭劳动力数量”的系数均比模型 AI 更大，其统计结果显著性水平更高，显著性水平均为 0.000。再综合前面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有 77.2% 的应答者选择“没有其他收入渠道，只能务农”^①，这充分说明“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或者说不能进城务工的最关键影响因素。

同时，只有在“目前务农，没有过非农工作经历”与“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比较中，个体健康状况才有影响，不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农，健康的农村居民倾向于务工。个体健康状况对于中国农村居民选择在农村务农，还是进城务工的影响并不是很明确，这可能是由于统计数据误差或者其他不明原因造成的，移民健康效应的存在也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就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值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有着显著性的影响。就年龄而言，年青一代处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早期阶段，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更高的期望，他们期望自己未来能过上城市居民的更优质生活，所以更可能选择进城务工；张同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16]。就性别而言，女性比男性选择务农的比例更高，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传统有莫大关系。就教育程度而言，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居民，其在城市务工谋生的成本相对更低，在城市获得工作的机会也更多。这与劳动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于同龄群体中哪些人更容易迁移，更可能进城务工，教育是一个最好的指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迁移率，即进城务工的可能性更高。但婚姻状况对于农村居民选择在家务农，还是进城务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已有的研究有些出入。有学者研究认为“已婚农民外出打工成本非常高，已婚农民退出或不参与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荒并存的主要原因”^[17]，但这在本文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此外，令人奇怪的是，老人数量对于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没有显著性的影响；未成年子女数量虽然有显著性的影响，但统计研究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农村居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倾向也越高，这与照料未成年人和老人的需要会制约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理论推测截然相反。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样本数据的差异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这都需要以后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业以外的可替代收入渠道的缺乏和基于家庭劳动力分工制约的家庭劳动力数量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与务工选择的关键原因。综合中国农村的现状，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农民种地不赚钱”，农村居民有进城务工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求；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却没有获得可以替代农村土地承包所能提供的、用于“安身立命”的稳定收入渠道，农村居民不可避免地在在家务农与进城务工之间徘徊。针对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给进城务工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替代农业生产

① 另外，在 CGSS 2010 年的调查问卷有效样本中，回答“目前务农收入还比较理想”为 7.8%，回答“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差不多”的为 4.7%，回答“有其他收入，务农不是主要收入”为 10.5%。

的“可替代收入渠道”。具体而言，至少可以通过两条路径来开展工作问题。第一是调整现有工业布局，推动产业转移，实现工业生产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从沿海地区到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市的转移，进而“实现农村居民工作地向家庭居所的统一”^[18]，如此，既能充分利用中西部，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大省大市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又能缓解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等问题。第二是为进城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可以替代农业生产所提供的收入保障模式，这需要同时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方面，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本质是一种劳动力要素的供给，要推动产业升级，顺应劳动力市场供需调节，提高进城务工农村居民的劳动力要素收益水平；另一方面，要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对条件成熟的进城农民工，即具有一定技术和能力的和城镇工业发展急需行业的务工农民给予城市居民待遇，为其家属提供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让有条件的农村劳动力实现由“务工”到“迁移定居”的转变。

（致谢：本文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实施的中国社会调查 2010 年相关数据，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本文在投稿过程中得到期刊匿名审稿专家的多次指点，在此对他所付出的辛苦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 [1] 陈文超. 农民种地不赚钱：基于现实调查的理性反思 [J]. 理论学习，2011，(4)。
- [2] Todaro, Michael.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59 (1)。
- [3] 蔡昉，都阳，王美艳. 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9。
- [4] Cai, Fang. Approaching a Triumphant Span: How Far Is China towards Its Lewisian Turning Point? [R]. UNU-WIDER Research Paper, No. 2008/09.
- [5]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J]. 经济研究，2010，(4)。
- [6] 丁守海.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2011，(5)。
- [7] 张学英.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J]. 南方人口，2005，(2)。
- [8] 石永明等.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财富增长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 [J]. 中国农学通报. 2008，(8)。
- [9] 田玉军，李秀彬，马国霞. 耕地和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J]. 资源科学，2010，(11)。
- [10] 陈会广，陈昊，刘忠原. 土地权益在农民工城乡迁移意愿影响中的作用显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
- [11] 同 [6]。
- [12] Ellen, M. Gee et al. Examining the 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in Mid-to-later Life: Findings from the Canadian Community Health Survey [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Supplement, 2004，(23)。
- [13] Heather Antecol and Kelly Bedard. Unhealthy Assimilation: Why Do Immigrants Converge to American Health Economics [J]. Demography, 2004，43 (2)。
- [14] Brian Gushulak. Healthier on Arrival? Further Insight into the “Healthy Immigrant Effect” [J].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2007，176 (10)。
- [15] 同 [13]。
- [16] 张同升.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变化分析 [J]. 中国市场，2011，(50)。
- [17] 范红忠，连玉君. 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及民工荒：基于湖北汉川的农户调查 [J]. 世界经济，2011，(11)。
- [18] 同 [6]。

[责任编辑 方 志]